

外交力

三国的深层逻辑

张程 著

残酷血腥的三国乱世，磨砺出最实用的求存图强之道
纷繁复杂的政坛风云背后，只有一个简单至极的逻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交力:三国的深层逻辑 / 张程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308-18700-8

I. ①外…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三国时代 IV. ①K23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8013 号

外交力:三国的深层逻辑

张 程 著

责任编辑 谢 焕
责任校对 杨利军 夏斯斯
封面设计 石几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11 千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8700-8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序

伴随着中国最近数十年的持续发展,世界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的研究领域也开始出现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热潮,不少学者和学生开始对中国外交的历史和特点产生兴趣。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我相信越来越多的读者会认同,中国的外交与西方的外交有共性,但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学的学人们应当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或“中国的外交学”。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程的《外交力:三国的深层逻辑》一书也是他在这方面所做的一次探索和尝试。

曾经有一位韩国学者来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希望能就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也就是国内通称的朝贡体系进行研修。朝贡体系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外交事宜。中国古代有着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和思想。这些是先人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外国的相关学科已经开始注意研究中国古代的外交制度、思想和实践。这些宝贵的外交遗产一直流淌在中国的外交血脉中,影响着今日的中国外交。国内学术界也越来越重视中国外交历史的研究,从中汲取养分。但是国内对中国外交遗产的挖掘还远远不够。

理解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看西方的历史,可是我们不一定非得用西方的历史来理解当今的国际关系。西方的很多例子在中国就遭遇了“水土不服”。为什么只是一味去关注古希腊和威斯特伐利亚,而不去关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和三国呢?我们对西方历史的了解肯定比不过西方人。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展示中国的特色。中国应该有一部分人去做中国自己的外交史和外交思想的研究。

现代国际政治建立在西方价值观念和游戏规则之上。中国是现代国际体系的迟到者和被动接受者。在西方外交思想和规范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本土的外交思想、规范和实践开始衰落。其实,与古希腊古罗马的那些城邦国家相比,中国更有资格炫耀自己悠久灿烂的外交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



期,中国大地上就形成了华夏体系。这个体系日后逐渐发展完善成稳固的朝贡体系。朝贡体系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彻底崩溃于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近代屈辱的历史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创伤和紧随而至的对西方先进文明及制度的学习,似乎使我们忽视了那些遥远的外交家身影和曾经响亮的声音。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重识外交历史,在国际政治领域发出中国的声音,是我们迫在眉睫的任务。

《外交力：三国的深层逻辑》一书就是挖掘中国外交遗产的有益尝试。我曾经做过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的研究,本书则将对古代外交的研究延伸到了秦汉之后,同时将观察的视角深入中国内部政权。在书中,作者以翔实的史实梳理了三国时期的外交历史,归纳出相关国别的外交战略。其中对吴、蜀两次外交联盟的介绍和对联盟理论的穿插分析,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特色的联盟征伐情况;其中对蜀、吴荆州战略的深入分析,将盛传的“借荆州”细化,纠正为“换江陵”,为我们理清了一桩纷繁复杂的历史公案。书中有关秦旦通三韩、张特守合肥城等有趣的外交故事,向我们展现了古代外交生动有趣的一面。

正如作者承认的,本书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并没有严格区分外交斗争和政治、军事斗争,对三国外交战略和战术的分析概括也略显简单。另外,还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虽然三国时期魏、蜀、吴三个政治实体各有各的地盘、军队和居民,互不隶属又相互承认,它们之间的交往具有典型的外交的特征,但它们都是秦汉统一中国的历史前提之下出现的,又都以实现中国的统一为最终的战略目标,而且后来三国又在不久之后重新成为一个统一国家。这又与一般国家的外交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本书不失为一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外交史作品。

中国的外交有几千年的历史,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传统,有不少知识和传统一直影响到当代中国的外交。相信张程的这本《外交力：三国的深层逻辑》会丰富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外交的认识,会对人们理解中国外交的历史有所补益。

是为序。

叶自成



前言

三国时期存在外交吗？

璀璨异常的三国历史是一座巨大的宝库。本书重点关注三国时期的外交历史和外交思想。它将带领读者走入三国时期各个割据政权之间的外交战场，近距离观察三国外交家的思想和实践；本书也将带领读者关注三国外交先辈筚路蓝缕的过程，思考三国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地位。

这是个崭新的领域，在论述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大量的疑问和思索。

一听说“三国外交”，人们往往首先询问：三国时期存在外交吗？

对于这个前提性问题的回答，涉及我们对外交的理解。现代人已经习惯了电视、报纸和杂志上展示的外交纵横。外交官们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各种外交场合上的潇洒表现，国家间频繁进行的照会、会晤和联盟等外交活动，连续公布的国际法、条约、协议和讲话为我们营造出一个现实中的外交世界。拨开这些表象，投眼于汗牛充栋的中国史籍，我们会发现，我国古代也存在这些外交概念。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外交概念。

外交史大家黎虎教授研究认为，商朝的甲骨文中就包含着外交记录。在商王朝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外交官和外交概念。当时的外交指的是中央王朝开展对外交往、允许诸侯各国相互交往的权力和一系列的活动。

春秋时期的鲁隐公^①元年（前722）祭国国君出访鲁国。《春秋谷梁传》中“隐公元年”一篇对此记载道：“襄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意思是说：周朝范围内的诸侯们，没有周天子的允许，是不能相互交往的。这可能是在史籍中最早出现的明确的“外交”一词

^① 鲁国国君。孔子作《春秋》，以鲁隐公元年起笔。由于春秋是以鲁国国史作为基础而编成的，所以当时很多大事都以鲁国纪年来编排。



的记载。可见,“外交”一词在古代人们的心中是贬义的。也就是在古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只有天子才有权利进行对外交往,外交是天子的特权。

但是这并不妨碍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往来的现实存在。西周时,由各诸侯国和周边政权组成的国家体系间围绕着周王室固定运转,不就是中国原始的外交体系吗?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外交与征战始终相伴随,碰撞出了辉煌的外交火花。葵丘会盟^①、问鼎中原、晏子使楚、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外交故事、外交人物和外交战略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秦汉以来,各项外交概念开始固定,外交范围拓展,形成了政府内部的外交制度。先秦时期的外交,还都是集中在现代中国本土范围内。经过西汉时期张骞凿空西域,“中国古代外交突破了本土和东亚的范围而开始走向世界”^②。位列九卿的大鸿胪,属于内朝系统的主客曹和行人、四方馆^③等各司其职,撑起了中华帝国的外交体系。中国主导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辉煌和中国在东亚的历史遗产就是在当时开始出现雏形的。

三国时期,国家的分裂并没有妨碍外交思想的流传。东吴使臣张温出使蜀汉,向蜀汉大臣称赞自己的副手(副使)。后来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张温因此获罪。《三国志·张温传》记载了骆统为张温求情的话:“向他国之辅,而叹本邦之臣,经传美之以光国,而不讥之以外交也。”这里的“外交”一词是贬义的,指的是大臣私自对外交往。这里具体指张温没有经过皇帝孙权同意,当着蜀汉君臣面评价东吴的大臣(副使)。骆统求情的时候,就认为张温虽然擅自评价己方大臣,但说的是好话,不是一般的“外交”。

事实上,“三国外交”的概念已经被人提出来了。张大可教授认为:“三国外交,特指三国形成时期的外交,起于公元208年刘孙结盟,止于公元229

①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宣读了盟约,周襄王也派代表参加,对齐桓公极力表彰。这次会盟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齐桓公成为中原的首位霸主。

②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8页。

③ 主客曹(也称客曹)是秦汉时期负责外交和朝贡事务的官署,后代废除;行人是掌管朝觐聘问的官职名称,后来逐渐变为使者,明清时期中国派往各个藩属的册封使一般由行人充任;四方馆是中央王朝接待各国使者和商人的官署名,同时负责与各国的通商事务。



年吴蜀订立中分天下的盟约,前后 22 年。”^①尽管笔者并不赞同张教授的分期,但完全认同张教授对外交的灵活理解。群雄竞起的乱世,各国都发展出了自己的外交制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外交实践和思想。这是我们观察统一盛世时难以获得的万花筒似的精彩画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与春秋战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一样,都是中国古代外交内容大放异彩的重要阶段。

我们得承认,即使是在缺乏理性思维、不擅长思辨和缺乏系统理论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依然闪耀着先辈外交实践和思想的光芒。三国时代存在中国古代外交。

再追根溯源,外交概念的本质是什么?现代外交概念由西方而来。现代外交的词源 Diploma 意为金属制的一分为二的护照和其他通牒。它是国家颁发的执行国家政策、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凭证。外交概念在产生之初就带上了强烈的国家实践色彩。

外交概念包含两个前提:国家和国家交往。外交概念带有两大色彩:国家色彩和主权色彩。

三国时期存在国家吗?讨论割据政权之间的外交是否可行呢?

那么,三国时期的曹魏、东吴、蜀汉和辽东^②是否可以算是外交意义上的国家?魏国的疆域东至大海,西到甘肃,北过长城,南达江淮地区;东吴接魏国南境,跨过长江中下流地区、五岭和珠江流域,直到越南中部;蜀汉保守今四川、云贵和陕西、青海等省一部。曹魏灭蜀的时候,蜀国人口约 94 万,魏国人口有 443 万。西晋灭吴的时候,吴国人口达到 230 万。灭亡的蜀汉和东吴两国,分别立国 43 年和 59 年,分别保持了 10 万和 20 万的常备军。这样的政权规模,即使按照现在的标准,也是大国。

三国鼎立之势形成后,“中兴汉室”这面旗帜失去了号召力。统一的汉

① 张大可:《三国史》,华文出版社 2003 年 1 月版,第 173 页。

② 辽东国的情况比较特殊。特殊性就在于辽东是向曹魏和东吴称臣的。但是公孙家族在辽东拥有完备的政府、强大的军队和连续几代人的牢固统治。它自降等级与各国的外交往来,是因为国小兵寡,不得不以低姿态在两大国间周旋牟利。但是称臣丝毫不影响辽东政权的独立性。四大国之外的其他割据政权国小而时短,没有形成稳固的统治。但是它们的外交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量在降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转移了天命的观念。魏、蜀、吴三国在义理上都成了平等的割据国家，三方角逐完全进入了道德与国力的竞争中。对于这三个国家以及辽东政权来说，谁治理得有条理，谁就能赢得民众的支持，赢得士大夫的归心，谁的力量就会不断增强。

当时参与以三国为核心的外交圈子中的，还有三韩、邪马台、大和、西域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些发展成了现代国家，有些逐渐融入了中国。但是在当时，它们都是有稳固统治的、独立的国家。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里的国家都不是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主权。但是，三国时期各国建立了对内绝对排斥的统治，在对外事务方面也是完全独立的。因此，三国时期的国家是存在的。同时，讨论割据政权内部、中央王朝与周边政权之间的外交是可行的。

所有对“三国外交”概念的疑问，都是受到现代外交概念约定俗成的影响导致的。当代人的头脑里似乎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想法，认为只有在现代国际环境中接触的外交才是外交。事实上，光辉灿烂的古代中国也存在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和外交思想。我们对它的怀疑本身表明我们对它的忽视。希望三国外交能够成为人们了解中国古代外交的一个切入口。

读者们可能又会问了：读三国外交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作为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中国是当今国际体系的迟到者。中国被动进入近代国际体系的时候，西方国家已经以自己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为基础，建立了完整的国际体系。

我们接受的外交教育和熏陶也是在西方理论和实践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普遍缺乏自己的国际视野。我们用它来分析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规划和指导我们的外交行为。甚至有部分人“言必称威斯特伐利亚”。遗憾的是，我们毕竟不完全适应那一套思维，很难用它来解释我们遇到的一切。

在日益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一再遭遇尴尬。中国在国际图书版权贸易中长期处于巨幅逆差地位，这令有着几千年深厚积淀的文化大国十分尴尬；近几年比较叫座的几部电影大制作，与其说是民族电影的希望，不如说



是在西方审美基础上点缀了中国元素;一年年地学人西渡,归国的那部分人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科技和文化,却依然改变不了国内一些学科起步低、理论零散、缺乏系统梳理的状况;海洋上出现越来越多中国船只的身影,但中国在海事纠纷中往往不能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事实上,对于国际竞争的许多“游戏规则”,我们都不能说了然于胸。

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国家竞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作为日益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尤其是作为崛起的中国的未来一代,我们如何理解国际事务中尴尬的现状,如何迎接中国在世界强国舞台上的登场?说到底,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视野看待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最基础的,我们要寻找我们的威斯特伐利亚,挖掘我们的传统世界观和外交思想,找到我们的国际思维原点。

三国外交就是闪耀着智慧光芒的中国外交遗产。挖掘它,继承它,可以为我们解释当今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提供借鉴,可以帮我们抽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主导的头脑中所出现的一缕遗憾和一丝无奈。

国家图存争霸,“外交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外交力是国家占有一定的外交资源,运用外交能力转化、配置外交资源,通过外交构想力提出富有成效的外交战略,结合外交意志,形成解决特定问题的外交力量。外交力影响国家的对外交往,随时随地随境况不同而不同。^① 对外交力的灵活运用,体现了执政者的能力,能优化国家的外部环境,也能把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四面树敌。并非“弱国无外交”,恰恰相反,弱国更需要提升外交力,或者在消解外患,或者在夹缝中求生存;如果能借力打力、以柔克刚,就能极大提升弱国的国际地位。在综合国力其他要素欠缺的情况下,弱国能拥抱的就是外交力了。同样,强国也不能忽视外交。不求事事锦上添花,但糟糕的外交连累整体国力、拖垮国家大政,也不能不防。三国外交便提供了两方面的生动例子,给外交力增添了中国特色、三国特产。

① 有关“外交力”的论述请参见:何洪兵:《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探讨》,载于《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一期。周俊:《外交力及其在中国外交中的体现》,2007年外交学院硕士毕业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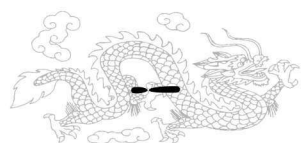


目 录

一	帝国的外交遗产	(001)
	中国第一位军阀	(002)
	不称职的掌舵人	(005)
	汉朝的外交遗产	(009)
二	天下尘埃落定时	(017)
	崛起于四战之地	(018)
	官渡没发生奇迹	(025)
	风云际会荆扬间	(033)
三	寻找平衡的联盟	(041)
	兵临城下的结盟	(042)
	围绕荆州的是非	(052)
	流向同盟的鲜血	(061)
四	国富兵强者胜出	(067)
	根深蒂固制天下	(068)
	攻吴伐蜀谁优先	(075)
	为他人作嫁衣裳	(078)
五	巴蜀慷慨北伐行	(083)
	权相与战争体制	(084)
	结盟与南北对峙	(092)
	巴蜀慷慨北伐行	(98)
六	割据南国第一朝	(107)
	据长江所极而守	(108)
	长江之险可偷安	(115)



金陵王气黯然收	(123)
七 蛇鼠两端的辽东	(129)
独立寒秋忙饮马	(130)
玩转三角终自毁	(134)
海东莫可与相较	(141)
八 三国外交战略篇	(145)
综合国力竞争论	(146)
三国地缘政治论	(150)
弱势的理想主义	(153)
九 三国外交谋略篇	(159)
用人是第一谋略	(160)
中国特色心理战	(166)
外交谋略大盘点	(171)
十 外事四夷的延续	(177)
延续：北方及西域	(178)
开拓：朝鲜和日本	(187)
远航：东海与南海	(192)
 外交年表	 (198)
参考文献	(203)
再版后记	(205)



帝国的外交遗产

董卓之蠢，在于他白白浪费了历史赐予他的巨大机遇，丧失了东汉王朝拨乱反正的最后希望。于是王朝的大厦轰然倒塌，一个乱世开始了！世道乱了，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中国政治文化中蕴藏着的外交思想和王朝的外交制度就是帝国世代相传的宝贵遗产。



中国第一位军阀

开启三国时代乱世大门的人，是董卓。

公元189年，职业军人出身的河东太守董卓，戏剧性地率军进入洛阳，诛杀宦官和大臣，掌握了朝政。他所面临着的是一个矛盾重重、政弊缠身的朝廷。东汉政治正处于或者拨乱反正或者全盘崩溃的十字路口。董卓的无知、鲁莽和他麾下凉州兵团的残暴，使得矛盾冲突如洪水般决堤而出，加速了乱世的到来。

董卓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但也不像后人描述的那么不堪。他这类人物在之前的中国历史上尚未出现，在之后的中国历史上倒是经常出现。后人专门造了一个名词，来形容董卓这样的政治角色——军阀。

作为中国军阀的先辈，董卓为这个群体的后来者树立了许多典范。

首先是在体态上，董卓极胖。他兵败被杀后，横尸街头。据说有人在他的肚脐眼上插了根灯芯。董卓肚中的脂肪足足燃烧了三天三夜。后来的唐代著名大军阀安禄山也是肚子极大，据说需要五匹马才能载起他。

其次是在个人履历上。董卓始终与军队（凉州军团）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亲自掌握队伍。之后历代的大军阀，无不牢牢掌控军队、崛起于行伍。军队私人化成了军阀的标配。

古代，俗语有云“好男不当兵”，行伍出身的人通常家世不显。董卓是凉州陇西郡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人，出身不高，父亲董君雅是县里的一个小官，最高做到了颍川郡纶氏县的县尉。董卓成年后也在老家郡衙门中谋了个监领盗贼的差事。

凉州地区主体在今甘肃省中部，在汉朝是边陲地区，气候常年寒冷，因此得名“凉州”。当地少数民族众多，出产当时中国最优质的战马和最彪悍的战士，骑兵素质甲天下。也许正是这种环境塑造了董卓彪悍、残暴的性



格。董卓小的时候就与少数民族豪帅结识,这为他日后在凉州军团的崛起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汉桓帝末年(大约公元160年左右),凉州地区的少数民族羌人的反叛行动日益高涨,东汉朝廷为安定边陲,提拔了一批当地豪强来平叛。董卓就以“良家子”的身份被提拔为羽林郎(中级军官)。董卓本就性格粗猛,体格健硕,到了战场上更是如鱼得水。史载他可以在飞奔的战马上左右开弓射箭。

凭借着过人的武力和多次征伐作战中累积的战功,董卓一路升迁,历任军司马、广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河东太守,终于晋升为高级将领。

董卓势力的日益坐大引起了朝廷的担心。中平六年(189),朝廷命令董卓交出部队,去上任并州牧。有兵有权又有野心的董卓岂肯就命,他上书说:“臣在行伍中十多年了,与军中上下的士卒日久情深。士卒们也都依恋臣的畜养之恩。臣愿意为了国家,率军到并州去,效力边陲。”他也不等朝廷同意,就率领军队去上任了。

一个军阀的身影开始出现了!

羸弱的东汉王朝当时已经无力对董卓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惩罚措施了。

汉灵帝的东汉,此时朝廷立国已久,像是个痼疾缠身的老人,各种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百姓怨声载道,最终在公元184年以农民起义的形式生了一场暴病,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巾起义。

朝廷虽然成功镇压了起义,但是实际统治已经动摇了。世族大家的势力恶性膨胀,地方政权分崩离析,中央政府内部宦官和外戚明争暗斗。汉灵帝在最危急的时刻出朝与群臣面议朝政,之后又回到深宫,与宦官相伴。

不久,汉灵帝驾崩,汉少帝即位。志士仁人想要澄清政治,黎民百姓也都盼着朝廷清明。洛阳城内的知识分子、朝臣和外戚们酝酿发动“尽诛阉宦”的计划。皇权专制衍生出了宦官专权的现象。宦官专权在道德上和实质上削弱了皇权,的确是导致东汉末期政治黑暗的原因之一,也是人们攻击的主要矛头。大将军何进和许多大臣都支持这一清除宦官专权的行动,以达到重尊皇权的目的。

朝臣们和知识分子要清除宦官专权是好的,但当时的做法却犯了几个



致命的错误。首先，主导此事的是外戚。何进是国舅，掌握外朝实权，即使行动成功了，最后也难免只是以外戚专权代替了宦官专权，并不见得是好事。

其次，何进的能力太差，靠裙带关系上台，不仅办事不密，而且优柔寡断。在调兵遣将完毕后，他觉得必须征得妹妹也就是皇太后的同意。但是皇太后终日需要宦官伺候，自然不同意诛灭宦官。昏庸的何进和朝臣们竟然另辟蹊径，想出了调外省军队入京“兵谏逼宫”的馊主意。这不仅在实质上削弱了皇权，还向天下明确宣告神圣的皇权不能解除身边的顽疾，而只能依靠外人的力量。

曹操此时在京担任禁军校尉，参与预谋。他极力反对征调外兵来诛杀宦官。他认为诛杀宦官让几个狱吏去办就行了，如果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而暴露了皇帝和朝廷的无能，是要引起天下骚动的。曹操最为担忧的是引狼入室，可能会造成军阀独霸朝政、削弱皇权。

但是曹操的看法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影响力，外省军队依旧被调入京。董卓的部队就是被征调的兵谏队伍之一。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是这么大的行动。宦官们早已得知了消息，趁外兵未到，就先下手为强，将何进骗到宫中，砍了他的脑袋。

何进的属下们闻此噩耗立刻红了眼，奋起神威，冲入宫中，大肆诛杀宦官。皇宫内一片血雨腥风。据说，当时还误杀了许多面部无须的男人。洛阳陷入了大乱。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时，董卓赶到了滑向混乱的洛阳。

董卓来的时机正好，可是带的兵并不多，开始时只有步骑三千人，实力远低于何进余部和洛阳周围其他军队。董卓也害怕自己兵少，不能镇服远近，但多年的军事经验教会了他使用计谋。在之后的四五天中，董卓让军队每天夜里悄悄潜出军营，第二天再大张旌旗擂鼓而还。洛阳城中各派和周边地区都以为董卓的军队源源不断而来，纷纷表示归附。就这样，董卓凭借着一个本朝前所未有的机遇，踏着宦官和外戚两派势力的尸体，征服了洛阳。



央朝廷既没有了宦官专权,也没有了主事的外戚集团,民心思定,何等清爽。另外,东汉政权是依靠世族大家的支持建立的,肇建之时就种下了豪强世族恶性膨胀的恶果。上百年来各个大家族累世公卿,把持朝政,让寒门士人和百姓寒心。而东汉末期豪强大族经历过起义、造反和内乱的打击后,势力衰落;董卓以平民出身入主朝政,得到了普通人的欢迎。

不称职的掌舵人

历史给予了董卓莫大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原本漏洞百出的东汉大船经过何进这一折腾,正在缓慢下沉。如果掌控不好,掌舵人将和船只一起没入海底。我们来看看董卓是怎么做的吧。

董卓此时已是相国,是东汉王朝实际的掌权者。他有机会也有足够的实力挽大厦于将倾。但是董卓虽然夺得了权力,却不懂得如何运用权力来促进国家的发展。

虽然他也做了一些积极的事,比如清理“党锢案”,拨乱反正^①;改革中央和地方人事^②;同时他继续推行地方上的州牧制改革^③。董卓的这几项政策使得之前被幽禁、没有机会出仕的人和长期得不到提拔的人受到了重用,赢得了好评。后世的史家也不得不承认董卓“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

① 东汉末年的两次党锢沉重打击了清议朝臣和知识分子们的政治热情与组织力量,闹得天下沸腾。现在董卓领衔追理陈蕃、窦武和其他党人,平息民愤。朝廷恢复了陈蕃等人的爵位,补偿他们的子孙。皇帝还专门遣使祭祀陈蕃、窦武等人。

② 他任命了吏部尚书汉阳周毖、侍中汝南伍琼、尚书郑公业、长史何颙等人,并且平地一声雷似的提拔毫无官历的荀爽为司空。这些人不是当时天下的名士,就是受到党锢牵连的人。

③ 他任命尚书韩馥为冀州刺史,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陈留孔伋为豫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尽管这些人后来都站到了董卓的对立面。董卓自己的亲信和爱将,虽然都受到了提拔,但主要还是担任军职,职务都不高。



群士”。

遗憾的是，对于困难重重、处于风烛残年的东汉王朝来说，拨乱反正已经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它需要的是庞杂的、客观可行的全面改革。然而，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董卓集团既没有做好全面改革的准备，也没有这样的能力。之后除了废除五铢钱、更铸小钱，希望改革业已崩溃的国家财政（结果因为钱品恶劣，导致物价飞涨）外，董卓集团的朝廷毫无其他作为。相反，军阀的残暴不法逐渐显露出来。

公元190年二月，董卓军队到阳城时赶上当地居民迎赛土神的集会。四方居民都聚在一起看热闹。董卓军竟然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发起进攻，杀死了所有的男子，夺取车牛装载妇女和财物。部队将斩获的男子头颅系在车辕轴上，浩浩荡荡地返回洛阳，宣称攻贼大胜。进入城门后，部队将所有头颅堆积起来焚烧，将妇女分给士兵作为婢妾。史载董卓法令苛刻，用刑很重，冤死者数以千计。“百姓嗷嗷，道路以目。”甚至还有董卓本人强奸宫女、公主的记载。

在进行拨乱反正的同时，董卓主导了东汉王朝的最后一次皇位更迭。当时在位的是汉灵帝的长子——汉少帝刘辩。他尚未成年，是何进的外甥。董卓以少帝无能为由，逼迫群臣同意更换皇帝，改立汉灵帝的幼子陈留王刘协为帝。刘协就是汉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汉献帝。不久，逊帝刘辩即被董卓毒死。更换傀儡只不过是为了巩固权势、操持朝政，对汉王朝的复兴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瓦解了本来拥护皇权的士人阶层对董卓的支持（他们原本是在重尊皇权的旗帜下聚拢在董卓周围的）。其结果就是，在拨乱反正之初选择支持董卓的士人阶层，经历皇位更迭后，马上转到了董卓的对立面。董卓的举措尽管为自己获得了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特权，却只是无端地授人口实，推人树敌而已。

与扶立汉献帝的举措一样费力不讨好的是迁都长安的决策。

董卓尽徙洛阳人口百万前往长安。一路上百姓们在步骑兵的驱赶下，互相踩踏，加上饥饿、疾病和寇掠，积尸盈路。董卓自己则留驻洛阳，指挥对首都洛阳的焚烧工作，使洛阳城方圆二百里成为一片废墟。董卓的爱将吕布则挖掘了东汉各座帝陵和公卿们的冢墓，掠夺珍宝。